

困牛山英烈千古壮举

■戚建国 叶小文

向西,走十二山梁子到川岩坝、困牛山的大路。红52团将敌人一步步引到了困牛山,自己却陷入敌军重围之中。此时,红52团只剩下400多人。

困牛山是贵州石阡县龙塘镇境内诸多山中的一座小山,海拔500米左右,南高北低,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长约一公里。困牛山的南、西、北三面有黑滩河环绕,山谷幽深,悬崖壁立,极为险峻。红军退到困牛山时,四周高山已被国民党军占领。为最大限度地保存有生力量,师长龙云率200余人攀悬崖下到河沟突围。团长田海清率100多位红军战士在困牛山上的鼎罐堡,依靠有利地形阻击敌人。红军战士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使敌人伤亡惨重,但团长田海清不幸牺牲。16日下午4时左右,面对英勇的红军战士,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军拿着枪躲在后面,胁迫当地老百姓走在前面,向红军战士一步步逼近。为了避免误伤老百姓,红军只能瞅准机会打击后面的敌人。陷入被动的百余名红军边打边退,一直退到了悬崖边上,他们退无可退。即使如此,他们宁死不当俘虏,也坚决不对人民群众开枪。100多名红军指战员砸毁枪支,从困牛山义无反顾地集体跳崖,跳下了数十米深的虎井沟(最高处70多米)。除个别红军战士被树藤阻挡幸存外,大部壮烈牺牲。

红52团指战员的英勇行动,为红六军团主力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贺龙对红六军团十分关切,不顾敌重兵拦堵,率红三军主力兼程南下,迎接红六军团。红六军团78天西征,转战5000余里,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与红三军的胜利会师,完成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赋予的光荣任务,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起到了开路先锋的重要作用。

红52团指战员以自己的行动感动了群众,影响了群众。红军到石阡之后,打击土豪劣绅,爱护穷苦人民,对老弱病残的人给予适当照顾,对帮助了红军的群众给钱给物。困牛山战斗中跳崖幸存的红军陈世荣曾告诉女婿覃智学:“土匪(指民团)穿的衣服跟老百姓一样,红军分不清楚是土匪还是老百姓。红军打老百姓,手软,没有狠狠地打。不然,红军不会那样惨,那么多人跳崖。”红军的壮烈行动,感召了当地的民众。1936年1月,红二、红六军团再次来到石阡县境内,已经有了一定觉悟的广大工农群众踊跃投身革命队伍,在短短13天时间里,红军就建立了12个游击大队和两个游击队,扩充了1000多名新战士。

困牛山红军英烈的英雄壮举已经过去88年,随着时间的冲刷日益彰显它的光彩。幸存者泣血的记忆、红六军团指战员深情的怀念、当地百姓的回忆,包括国民党报纸和资料对困牛山战斗的记载,都在不断还原着它的历史原貌。而红军指战员以激烈的战斗和英勇的牺牲,为红六军团主力的胜利突围赢得了时间,为中国革命的绚丽画卷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失散在龙塘川岩坝困牛山一带的十多位红军,对此次跳崖壮举记忆犹为深刻。跳崖被树藤阻挡得以生存的司号兵陈世荣生前说,红52团为了拖住敌人,战斗十分激烈,“我们四百多人,全被打垮”“有一百多红军跳崖”“红军跳崖不是在一处,是一段,顺河沟一线”。幸存红军黎国兵讲,红军“在川岩坝一个光秃秃上四周被围,边打边退,退到悬崖边,有一百多人约一个连跳崖”。

当地有些民众目击了这场惨烈的战斗,记住了英雄的事迹。当年11岁的姚祖华回忆:他当时就躲在困牛山上,“红军是从三步跳上面虎井沟那里跳的崖,红军下去滚成许多草墩墩”。三合乡的刘光荣老人回忆道:“河底下死的多,有些还挂在半岩,到处都是,百把人不止。”核桃湾老人刘朝选回忆:“红军打枪打得很高,不乱打,不打百姓。”

在当时国民党的档案资料里,也保存了困牛山战斗和红军跳崖的部分记载:1934年10月19日的《黔军军部电川岩坝战况通报》称:“红六军团”顽强抵抗,冲锋十余次,全用肉搏”“伤亡逃散及跳河者近千人”。湘军独立第32旅旅长胡达的

《关于追剿红六军团战斗详报》、石阡县保安团指挥李采书的《呈报萧克部战况情况》、湘军李觉的《湘军李代司令详述追剿始末》等20多种旧政权档案资料,都对甘溪、困牛山等战斗的记载。

红六军团与中革军委的往来电报、红六军团首长的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史研究部门所撰写的史书均有对这一事件的记录。红六军团首长在1934年10月25日致电中革军委:“六军团现只有五十二团八百余人未到,其余已集中编成三团。”时任红六军团团长萧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五十二团是湘鄂赣久经战斗的部队,在行军中为后卫,遭敌包围,全团苦战数日,惨遭损失,十八师师长龙云惨遭杀害。”《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记载:“第五十二团的战士们在困牛山殊死战斗三昼夜,弹尽粮绝,团长田海清牺牲。”《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记载:“在战斗中与主力失去联系的红52团,在红18师师长龙云率领下,在困牛山一带与敌激战三昼夜,终因孤军奋战,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团长田海清牺牲,百余红军战士跳崖壮烈牺牲。”

困牛山战斗中,红18师第52团指战员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同时他们以自己的牺牲掩护了军团主力的突围,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甘溪战斗后,红六军团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担任断后的红52团不畏强敌,在板桥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完成掩护任务的红52团向南追赶军团主力,在大田再次遭遇敌人截击。为避免敌人探知红军主力转移方向,龙云、田海清果断带领红52团由南转向,向西进川岩坝,激战困牛山,以巨大的牺牲为军团主力的顺利转移赢得宝贵时间,使得军团主力胜利突围,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

红52团指战员以自己的行动感动了群众,影响了群众。红军到石阡之后,打击土豪劣绅,爱护穷苦人民,对老弱病残的人给予适当照顾,对帮助了红军的群众给钱给物。困牛山战斗中跳崖幸存的红军陈世荣曾告诉女婿覃智学:“土匪(指民团)穿的衣服跟老百姓一样,红军分不清楚是土匪还是老百姓。红军打老百姓,手软,没有狠狠地打。不然,红军不会那样惨,那么多人跳崖。”红军的壮烈行动,感召了当地的民众。1936年1月,红二、红六军团再次来到石阡县境内,已经有了一定觉悟的广大工农群众踊跃投身革命队伍,在短短13天时间里,红军就建立了12个游击大队和两个游击队,扩充了1000多名新战士。

一百多名红军指战员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误伤百姓,毅然集体跳崖的英雄壮举,是人民军队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和不负人民的生动写照,是红军将士听党指挥、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光辉典范。困牛山红军英烈的千古壮举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光辉实践,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听党指挥,服从大局的绝对忠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困苦、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红六军团第18师第52团指战员,在远征战斗中充分展现了对党绝对忠诚的精神品格。党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绝不讲任何条件。时任红52团总支书记的杨尚

高回忆说:“那时五十二团的战斗力很强,前面有情况就调五十二团到前面,后面有情况就调五十二团到后面。”追击红六军团的国民党湘军旅长胡达也感慨,红军“服从命令,拥护首领,达到任务,动作迅速,种种似不能不公认的”。无论形势多么严峻,无论任务多么重大,无论战斗多么激烈,红52团指战员始终服从大局,听从命令,不管付出多少牺牲也要坚决完成任务,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对党的绝对忠诚。

不畏艰难,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困牛山战斗,面对重重包围上来的敌人,红52团指战员没有一个人叛变偷生,没有一个人畏敌逃跑,宁死舍生取义,跳崖明志。一直率红52团征战的师长龙云在战斗中受伤被俘,他在敌人的牢笼中坚贞不屈,拒绝投降,最后壮烈牺牲。时任红18师政委的甘泗淇说,52团“为革命流了最后的一滴血”。国民党军在它们的战报中也不得不承认,红军“对于其主义,信仰甚深,故拥护首长,甘心效死疆场”。以红52团指战员为代表的红六军团将士,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出对党的忠诚,表现出坚贞不屈的革命情操,诠释了理想信念的巨大作用。

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红六军团在战略先遣行动中几次陷入国民党军重围,但都凭着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战胜强敌,迎来胜利。国民党军亦感叹红军大无畏的战斗精神。黔军称,红军“顽强抵抗,冲锋十余次,全用肉搏”;湘军称,红军“虽极少数,抵死顽抗,非有上官命令,绝不撤退”。红52团指战员在困牛山的壮举,以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谱写了中外战争史上悲壮的篇章,成为人民军队战斗精神的最好写照。

牢记宗旨,人民至上的爱民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在困牛山战斗前后,红军在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仍然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坚持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打土豪,处决恶霸地主,救济贫苦群众。困牛山战斗中,面对被胁迫来的不明真相的群众,红52团一百多名指战员宁死不伤百姓,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体现了深深地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

困牛山红军英烈集体跳崖的壮举,虽然已经过去88年了,但他们的英雄事迹却在新的时代被更多的人学习传诵。这些英勇的烈士虽然在困牛山倒下了,英雄却在岁月长河中永垂不朽。他们是人民军队杰出的代表,是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他们将永远受到全国人民的怀念和敬仰。



1942年5月2日延安,天气晴朗,阳光明媚。

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延安文艺座谈会将要开幕了,参加会议的人们,正陆续走进会场。毛泽东在周扬陪同下,欢迎每一位参加会议的作家、艺术家。其中不少人他都是很熟悉的,说说笑笑,气氛很是融洽活跃。当见到《八路军进行曲》词作者公木时,毛泽东含笑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时任八路军直属政治部文艺室主任的公木,顿感一股热流沁入心里。

作为一位来自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公木有幸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并与大家共同交流学习体会和创作经验,这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珍贵而难忘的回忆。他后来曾说:“当听过毛主席讲话后,我随大家蜂拥到办公厅门前不大的一块场地上,由吴印咸同志摄影,把毛主席簇拥在核心,坐在横倒的一棵大树干上,人人脸上流露出幸福以至陶醉的笑容。毛主席的讲话,不仅是精美的精神食粮,而且是醇化的心灵甘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激励着公木和他的战友,拿起笔,运用各种文艺形式,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事业,更加自觉地战斗。

公木原名张松如,出生于河北辛集北孟家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8年,他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也更加关注中国社会出路和发展前途等问题,思想认识不断进步。1930年,公木因参加纪念“八一”南昌起义、反对军阀混战的示威游行而被捕。在狱中,他毫不屈服,坚持斗争,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获释后,他作为左翼作家和学生运动骨干,更积极地投身到救亡运动中。

20世纪30年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发动野蛮侵略,肢解和吞并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当时身在北平的公木,怀着抗日救国的一腔热血,几经辗转,来到陕西。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林伯渠同志介绍,他马上奔赴山西前线,到晋绥军区开展宣传工作。在巍巍的太行山下,在辽阔的抗日战场上,他创作了长诗《岢岚谣》。诗中叙述春寒的一天,在山西忻州岢岚山区的三义湾,六十来岁的姜老汉用有毒的食物,做成满桌饭菜和敌人一起吃下,同归于尽,壮烈牺牲。这首诗悲壮感人,有血有肉,是中华民族正气凛然、宁死不屈的精神,在一个普通农民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1938年,公木渡过奔流不息的黄河,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宝塔山下,延水河边,公木先后创作了大量讴歌八路军将士英勇战斗、反映根据地人民辛勤劳动的诗篇。这些作品,从艺术形态看,主要有两类:一是长篇叙事诗,以富于民歌韵味的形式叙述广大军民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二是短篇抒情诗,以自由诗体抒发诗人丰富的情感和坚定的信念。其代表作,前者当推《风箱谣》《十里盐湾》等;后者当推《我爱》《再见吧,延安》等。

在延安,公木全身心投入到许多具体工作中。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文艺活动,结识了萧三、艾青、何其芳、贺敬之、光未然、洗星海等艺术家,相互学习,切磋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在他当年所结识的这些战友中,彼此感情最深的就是音乐家郑律成。

1939年初,公木调到抗日军政大学,担任政治部宣传科干事。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一次,当时同在宣传科工作、担任音乐指导的郑律成,无意间看到公木抄写在笔记本上的诗稿,不禁暗自称赞,于是为《子夜岗兵谣》等作品作曲,后来连将近二百行的《岢岚谣》也谱写了出来,这让公木大为感动。在此之前,郑律成谱曲的《延安颂》《延水谣》等歌曲,早已在延安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多次交流后,二人相约合作《八路军大合唱》。当年7月,抗大总校东渡黄河,迁往敌后,公木和郑律成都留在了延安,分配到筹办中的抗大三分校工作。在此新旧交替之际,二人通力合作,满怀激情完成了这部大合唱。

《八路军大合唱》包括《八路军军歌》《炮兵歌》《子夜岗兵谣》《八路军进行曲》《冲锋歌》和《快乐的八路军》等篇章。各篇章相对独立,而又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意境深邃,感情激越,音韵铿锵。1939年10月,鲁艺音乐系和抗大女生学组成的演出队,由郑律成指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了《八路军大合唱》的首场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此后,这部大合唱从抗大传唱到各机关、部队,唱遍了延安、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抵御外敌的斗争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正是由于公木在诗歌创作上的突出成就,1942年5月,他以部队文艺代表的身份,应邀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当他

风烟滚滚军歌壮

■郭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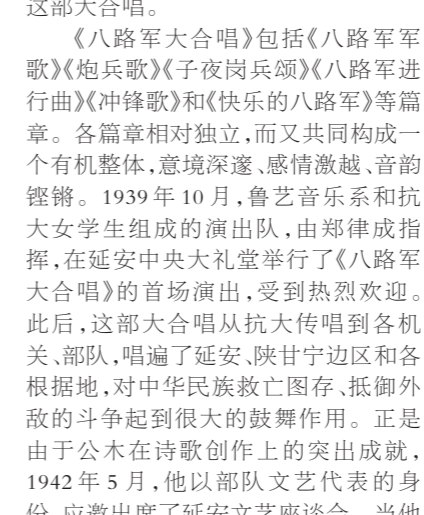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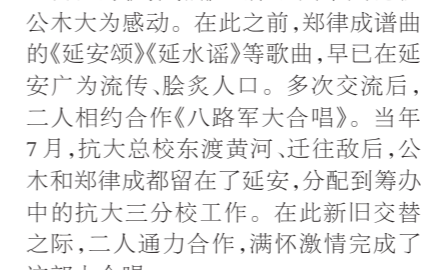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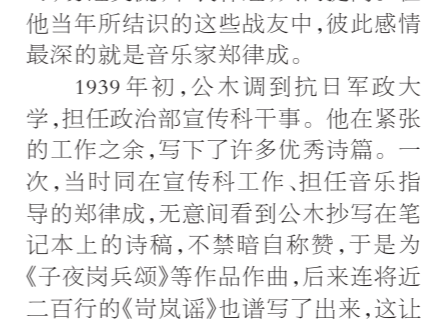
迎着旭日,渡过延河,来到杨家岭会场,聆听毛泽东的讲话,内心的激动之情,自然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这两首军歌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其中,《八路军进行曲》在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成为激励人们奋勇战斗、实现美好理想的嘹亮号角。

1965年,《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再次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并于1988年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由此,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广泛传唱、激发了无数中华儿女抗击侵略、争取解放的昂扬斗志之后,由公木作词、郑律成作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终于正式定型了。同时,解放军原总参谋部、原政治部联合发出的通知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体现了我军的性质、任务、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反映了我军光辉的战斗历程。正式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一定会激励全军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努力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肩负起建设四化、保卫四化的历史重任。高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将使我们更加振奋革命精神,激发战斗热情,增强革命军人的光荣感、自豪感和使命感。”

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作为诗人的公木,依然葆有澎湃热烈的创作激情。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他在紧张繁忙的工作间隙,坚持创作,写下了大量富有时代气息、洋溢着感人力量的优秀篇章。其中既有歌颂时代巨变、气势磅礴的抒情诗,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又有表现基层民众生活、细腻温馨的叙事诗,如组诗《鞍山散歌》,题材多样,内容丰富,艺术境界也更为广阔开阔。难能可贵的是,无论工作岗位和人生经历如何变化,他那乐观开阔的胸怀没有变,坚定执著的信念没有变。

1963年,公木经过精心构思,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巴金的中篇小说《团圆》改编而成的电影《英雄儿女》,创作了气壮山河的主题歌《英雄赞歌》:“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这首歌热情赞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奋勇无畏、浴血搏斗的英雄形象,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歌曲。此后,这部大合唱从抗大传唱到各机关、部队,唱遍了延安、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抵御外敌的斗争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正是由于公木在诗歌创作上的突出成就,1942年5月,他以部队文艺代表的身份,应邀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当他



回望初心 幸福之根,复兴之源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奉命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遣探路,拉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红六军团转战赣、湘、桂、黔4省,先后突破国民党军4道封锁线,于10月7日进至贵州省石阡县甘溪地域,陷入敌军24个团的重围之中。红六军团第18师第52团为掩护军团主力突围,将敌军诱至石阡困牛山地区,与敌激战三昼夜,掩护军团主力成功突出重围。坚守困牛山的100多名红军战士,面对国民党军的疯狂攻击,浴血奋战,英勇顽强地打退了敌人一次次冲锋;但面对被胁迫迫在敌人前面的当地群众时,他们为了不伤及人民群众,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集体跳下几十米深的悬崖,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红军英烈的千古壮歌。

1934年夏,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指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陷入困境。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开始酝酿向湘西地区战略转移,准备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红二军团)会合,以图扭转愈来愈严峻的不利形势,重开革命新局面。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在湘赣苏区艰难进行反“围剿”斗争的红六军团,于1934年8月7日由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执行到湘中创建新的根据地并联络红三军,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侦查探路的重大任务。红六军团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军政委员会,全军团西征出发时共9700余人。

国民党军发现红六军团突围后,即调各部进行围追堵截。从8月底至10月初,红六军团连续突破国民党军4道封锁线,向乌江急进,准备寻找有利渡场渡乌江,彻底甩掉追堵之敌,然后向北实现和红三军的会合。

此时,参加围堵追击的国民党湘桂黔军闻紧急调动部队,集聚力从三面合击,企图将红六军团消灭在石阡地区。10月7日,红六军团进入石阡县甘溪镇,与敌展开阵地争夺。战斗异常激烈。处于被动地位的红六军团将士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最终暂时摆脱了敌人,但“人员、弹药、精力消耗极大”,部队亦被截为三节。而国民党军集中了24个团的兵力防堵,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消灭红六军团。渡江未成后,危急之中,军团首长决定采取灵活的游击动作,寻机突破敌人的包围,迅速转入黔东苏区与红三军会合。红军在石阡以西人烟稀少的山区艰苦作战。担任后卫的红18师第52团奉命改为前卫,在险峻的深山老林中披荆斩棘,开拓道路,形势非常严峻。

10月15日,红六军团主力准备前往印江与红三军会合。担任前卫的红52团进至板桥附近时,遭遇湘军堵击,又一次陷入国民党湘军和黔军的层层包围中。10月16日,根据军团命令,红18师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率部已与湘敌对峙一昼夜的第52团800余人,由前卫改为后卫,阻击敌人,掩护主力向甘溪地区转移。红52团指战员阻挡住了敌人一次次疯狂的进攻。在朱家坝一带完成断后任务后,面对紧紧追来的国民党军,为保证军团主力顺利转移,龙云、田海清率全团没有尾随主力向南转移,而是改道

